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草原帝国

[法] 勒内·格鲁塞◎著
黎 荔 冯京瑶 李丹丹◎译

K289
G2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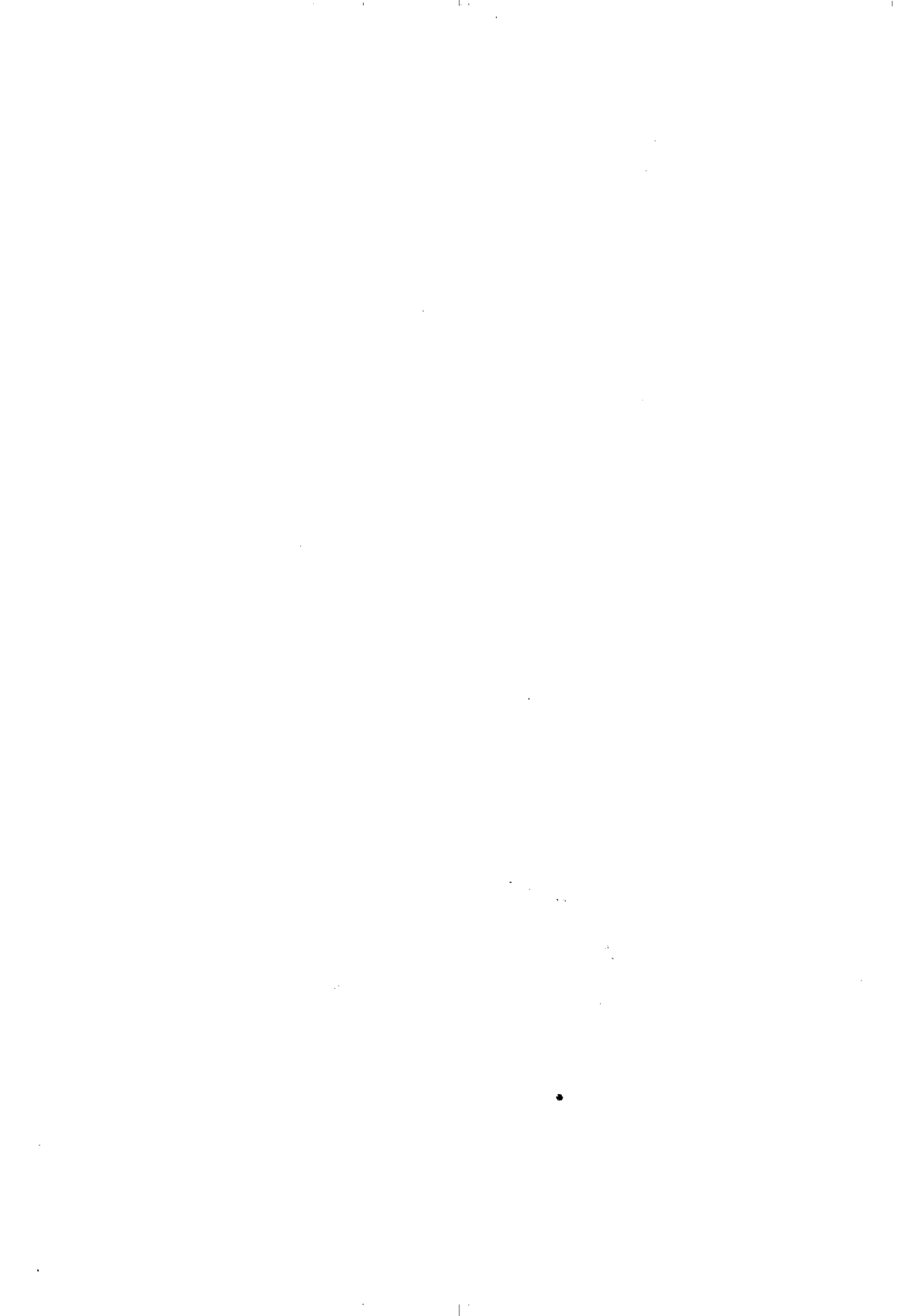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草原帝国

法内·格鲁塞◎著
黎荔 冯京瑶 李丹丹◎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序

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历史回忆录里看到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等人的名字。西方的纪年学者以及中国或波斯的编年史家将他们的形象通俗化，并记载了下来。他们这些游牧人竟然出现在文明时代，甚至仅用了几年时间便将罗马、伊朗或中国变成一堆废墟，实在堪称伟人。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很难解释他们的出现、活动，以及他们的消失，甚至将他们看成上帝降下的灾难和对古老文明的一种惩罚。

但是，人类生来就是大地的儿子，这一点从未改变。环境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只要找到他们的这一生存规律，便能够对他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草原的环境造就了这种身材矮小粗壮、桀骜不驯的人，并让他们能够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继续存活下去。高原猛烈的风塑造了他们的五官，使他们变得眼睛细长、颧骨突出、汗毛稀少、骨骼坚硬。他们总是喜欢在有水草的地方居住，这种生活需求决定了他们的游牧制度，使得他们与当地人的接触更加频繁，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礼貌的借贷，也有可能是屠杀性的掠夺。

三四位亚洲大游牧者的出现，缩短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偶然，那么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他们之中有三个人完成了惊人之举，成为世界的征服者；但还有很多的阿提拉与成吉思汗们只成功地建立了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山到波斯间的占亚洲四分之一面积的帝国，这已经可以算作大规模的冒险行为。

历史上有过很多伟大的野蛮人，我在这里要提到的是被邻近民族认为是野蛮人的人。凯尔特人曾经长期被罗马人看做是野蛮人，日尔曼人被高

卢人看做是野蛮人，而斯拉夫人则被日尔曼人看做是野蛮人。中国南部的居民也曾长期被黄河流域的原住中国居民看做是野蛮人。这些地区虽然地理条件不同，但都形成了农耕的生活方式，因此到了中世纪后期，整个欧洲、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及中国几乎达到同一物质文明阶段。

然而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方却得以免于这种变化，那就是绵延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的草原地带。这个地带从满洲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除了一些孤立的小块土地还可以耕作，那里的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作物生存，居民们只得永远过着畜牧、游牧的生活，甚至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更有甚者，这些部落中的部分人，即处于森林地带的部落，还停留于马格德林式猎人的文化阶段。于是，草原和森林地带便成为野蛮人生活的保留地，这当然不是说那里的居民在品质上比其他民族低下，而只是因为那些人长期停留于早已被其他地区居民淘汰了的生活方式。

当亚洲的其他地方早已到达了极其先进的农业阶段时，这部分停滞在畜牧阶段的人们的继续存在对历史的剧变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存在表明了临近居民之间存在情况的巨大差异——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12世纪的人生活在同一种状况。从蒙古高原南下到北京，从吉尔吉斯草原北上到伊斯法罕的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引起的灾难十分严重。对于中国、伊朗、欧洲的居民来说，匈奴、突厥、蒙古人是真正的野蛮人，必须去恐吓和哄骗他们，好让他们远离耕地。至于那些游牧人，他们的心情是可以揣测的。旱天里，那些贫苦的蒙古游牧者离开那些荒芜的草原，来到农田的边缘，在那里好奇地观赏居民的文明奇迹、丰富的谷物以及都市的繁华。确切地说，这种奇迹中所隐藏的秘密，即在建立这些“人类蜂窝”时所付出的艰辛是不可能被匈奴人所了解的。那些匈奴人被看做是从雪地里走过来的狼——匈奴人的“图腾”——一群看到篱墙内的猎物的狼。一千多年来，他们由于条件反射而会突然地侵入、掠夺，带走战利品后继续逃亡。

畜牧和狩猎人类继续与农业人类并存，甚至可以说，如果日趋富裕的农业社会接触到停留在畜牧生活并因天旱而遭遇可怕饥荒的畜牧社会，那么可以说在极显著的经济对比上又加上了时常是极其残酷的社会对比。再进一步可以认为，就是这种人文地理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定居者与游牧者相互之间的感

觉，就等于一个近代城市中所包含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在农业社会里，不仅有华北肥沃的黄土地带，还有伊朗的果菜园地或者是基辅丰饶的黑土地带，但被一片贫瘠的牧场区域所包围，这地区的气候条件是可怕的，十年之中总有一年水要干涸，草要枯黄，牲畜要死亡，人也要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定期地向农耕区域发起攻势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这些突厥人或蒙古人属于一个智慧、沉着、活动能力强的种族，早已适应了艰苦的环境，自然养成了统率众人的才能。定居者则时常是颓废的，往往会在冲击之下崩溃。游牧人进入城市后，先是屠杀，接着便毫不费力地取代被他们打败的统治者。他们大胆地登上尊贵的王位，成为中国的可汗、波斯的王子、印度的皇帝。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很快便成为北京的半个汉人，或是伊斯法罕和雷依的半个波斯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草原与农业区域之间的和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吗？绝对不是。人文地理上的严酷法则将继续起作用。即使汉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们没有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击，没有被逐渐地或是突然地淘汰，也会有新的部落出现于他们的边境。那些草原深处的正在忍受饥饿的部落只把他们的堂兄弟看做是暴发的塔吉克人或拓跋人、波斯人或汉人，他们将重新开始不利于他们的同类的冒险行动。

因为从匈奴占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正好经历了1300年，在这种常常是成功的冒险中同一旋律便几乎重奏了1300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游牧民族在那个时代虽然物质文明非常落后，但军事方面却保持着极大的优势。他们是骑射手，由优良的射手组成了十分机敏的骑兵队，这种专门“武器”使他们在定居民族面前保持着一种优越性，就像近代欧洲的炮兵部队在其他国家面前显现出来的优越性一样。毫无疑问，汉人或伊朗人并没有忽视这种武器的袭击。公元前3世纪，汉人便改变了自己的装束，用来适应骑射的突袭；在伊朗，便是从帕提亚人时起就尝到了一群奔逃的骑士射出的飞箭的滋味。但无论是汉人、伊朗人、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是匈牙利人，在这方面都不能和蒙古人相抗衡。蒙古人自幼就会追逐奔驰在无边

无际的草原上的野鹿，习惯于长时间地埋伏及猎户的各种诡计。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食物的，在这里他们所向无敌。但他们并不总与敌人对立，相反，他们总是出人意料地攻击敌人，然后立即逃走，再次出现时，便猛烈追击敌人，却不让敌人牵制住，将敌人围困，使其精疲力竭，最后才去打倒那些疲劳得像难以逃脱的猎物一样的敌人。这种骑兵队的灵活机动性，使得人们对他们产生一种无处不在的幻觉。成吉思汗的两位有名的战略家（哲别和速不台）将这种幻觉变成了一种巧妙的战术。卜兰迦宾与鲁卜鲁克曾经看到这种战术的实施，他们特别注意到这种战术的特殊优越性。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消亡了，因为它们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如同所有的有组织的国家一样，经历了建立、存在和灭亡阶段。但草原上的骑射手们统治了欧亚大陆13个世纪，因为他们是那里的大自然的产物，经历了无数的饥饿和痛苦。骑射是游牧民族唯一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可以使他们免遭饥饿和灭顶之灾。因此，即使成吉思汗能够在早些时候征服世界，那也是因为他这个被遗弃在克鲁伦河草原上的孤儿能够和老虎一起每天猎取到足够的野生动物，才不会被饿死。

骑射手总是忽然地出现，射击，然后逃跑。并且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非直接性射击的杀伤力几乎相当于现今的炮队。那么为什么这种优越性如今不复存在了？为什么16世纪后游牧民族不再对定居民族产生威胁了？正是因为定居民族已经用炮来对付他们了。定居民族在很短的时期内人为地获得了一种优越地位，彻底改变了他们几千年形成的彼此间的关系。伊凡雷帝用大炮驱散了金帐汗国末期的继承者，而中国皇帝康熙也用火炮慑服了喀耳木克人，标志着世界历史一个时期的终结。军事技术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文明远远强大于野蛮。在很短的时间里，游牧民族的传统优越性便难以置信地成为了过去。公元1807年，亚历山大一世还在战场上幻想用喀耳木克的骑射手来抵御拿破仑，但他们的表现就像是猎手们出现在马德林时期一样不合适宜了。

仅仅经过了300年的时间，那些射箭手便不再能够主宰世界了。



目 录
CONTENTS

导 言 草原与历史 / 9



第一部 公元13世纪前的亚洲高原

第一章 草原上的古代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人 / 19

第二章 中世纪初的突厥、回纥和契丹 / 79

第三章 公元6—13世纪的俄罗斯草原 / 121



第二部 成吉思汗蒙古人

第四章 成吉思汗 / 133

第五章 成吉思汗最初的三个继承人 / 189

第六章 忽必烈的统治 / 213

第七章 钦察汗国 / 239

第八章 帖木儿 / 255



第三部 最后一批蒙古人

第九章 罗斯的蒙古人 / 273

第十章 昔班家族成员 / 281

第十一章 公元15—18世纪蒙古境内的最后一批帝国 / 293

译后记 / 327

导言 草原与历史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亚洲高地证明了地球历史上最重大的地质演变。这片巨大大陆的隆起是高度不等的两大古老山脉褶皱而成的，一个是天山和阿尔泰山上有森林覆盖的褶皱，由东突厥斯坦地垒褶皱和安加拉河流域古老的西伯利亚地台组成；另一个是阿尔卑斯式的喜马拉雅山的褶皱，它在3世纪的中新世时期占据着古欧亚“地中海”的位置。西北的天山和阿尔泰山构成的凸形弧与南方的喜马拉雅山的凹形弧包围和孤立了突厥斯坦和蒙古，使这两个地区好像是悬挂在周围的平原上。由于远离海洋，再加上海拔高，使这片高原地带的气候呈现极端的大陆性，夏季酷暑，冬季严寒。蒙古的库伦气温在38℃与-42℃之间剧烈摆荡。而在西藏高原则大不一样，它的海拔差异使得当地的植物生长情况几乎是南北两极性的。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半圆形山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使得常见的植物层由凹地的森林到山顶的稀有植物，同样具有高山性的特点。亚洲高原的其余地区被一片冬季枯死、夏季萎黄的纵向草原地带所掩盖，草原牧场在灌溉地区是生气勃勃的，在中央旷野地区则是死气沉沉的，正处在撒哈拉沙漠化的过程中。从满洲到克里米亚半岛，从蒙古高原的库伦到马里和巴里赫地区，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牧场延伸形成伊朗和阿富汗的热带干草原，这种草原与地中海区域的草原比较类似。

欧亚大陆的纵向草原地带直接与西伯利亚气候支配下的北极森林区域相连接，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直至蒙古和满洲的北方边境。大陆中部的三个沙漠化的中心地区正在逐渐变成荒原：河中地区的克齐尔库姆沙漠和阿姆河南部的卡拉库姆沙漠，塔里木河所环绕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戈壁沙漠从西南向东北伸展的广阔地区；该地区在罗布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连，一直延伸到满洲边境的内兴安岭。三个大沙漠像癌细胞扩散般地蚕食草原地带，

这种现象从原始社会起就没有停止过。戈壁沙漠在北蒙古（从古代匈奴人到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贝加尔森林、鄂尔浑河流域与克鲁伦河流域的草原地区）与南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察哈尔和热河的草原地区）之间的穿插，是蒙古帝国持久性残存的原因之一。沙漠边的草原给今天被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那里的人们脱离了游牧生活，发展绿洲上的城市和商业生活，这些绿洲串接起来，使得地中海世界、伊朗、印度和中国的各种伟大文明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干枯了的塔里木河岸上，形成了南北两条弧形小道，北面经过敦煌、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喀什、费尔干纳及河中地区；南面经过敦煌、和阗、叶尔羌、帕米尔山谷及巴克特里亚。这两条路线经过沙漠和高山时的痕迹就像蚂蚁穿过田野时的痕迹一样显得细长而模糊不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条小道结束了我们地球上两个不同世界的隔绝，使得中国人的领地和印欧人的领地之间有了一些细微的接触。它们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商务和宗教经由那里传递，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的佛教使徒们也是从那里经过的。《托勒密书》中提到了希腊和罗马商人曾经企图通过那里获得“丝国”的绢；后汉时期的中国将领们曾经希望通过那里与伊朗及东罗马帝国建立联系。因此，从汉朝到忽必烈时期，中国政治的一贯政策中就包括维持这条世界贸易大道的畅通无阻。

就在这条通往文明的大道北面，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无边无际，又细又长，通往野蛮世界。在鄂尔浑河或克鲁伦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野蛮人的骑兵队的前进步伐是无法阻止的，因为这里的大阿尔泰山似乎与天山的北部支脉更加靠近，在塔尔巴哈台的楚古查克附近的额敏河方向有一个更宽大的缺口，它在裕勒都斯河、伊犁河与伊塞克湖盆地之间是十分宽阔的，而在其西北方向，来自蒙古的骑士脚下正展现出无边无际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从东方草原上来的游牧部落的骑士们曾经不断地穿过塔尔巴哈台的阿拉套山和穆扎尔特山的山口，到西方草原上寻找财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前，这种运动可能更多的是采取相反的方向，人们的印象是伊朗种（印欧种人）的游牧民，即希腊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伊朗碑文证实为萨加人，必定朝东北方向深入了很长的路程，到帕兹雷克和米努辛斯克地区；而另一些印欧种人在塔里木诸绿洲上定居，分布在从喀什到库车、焉耆和吐鲁

番，甚至远至甘肃。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公元初年起这种流动就是从东向西进行的。那时已经不仅仅是“东伊朗语”、库车语或吐火罗语等印欧语种占主导地位，在俄罗斯南部和匈牙利，有称做“匈”的匈奴人将开始建立原始突厥帝国。匈牙利草原是俄罗斯草原的延伸，而俄罗斯草原则是亚洲草原的延伸。匈奴之后，在公元6世纪，蒙古游牧民族的后代阿瓦尔人，受到突厥人的压迫，从中亚细亚逃亡，先在俄罗斯后在匈牙利建立了统治。此后，7世纪的哈扎尔突厥人、11世纪的佩彻涅格突厥人以及12世纪的库蛮突厥人走的都是同一条路。最后，从北京到基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人造草原，这是由13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完成的。

这些蒙古游牧部落互相排挤以争夺最好的牧场，有时只是为了畜群的需要他们会不断地迁徙，这种迁徙不定的状态在某种情况下会持续几个世纪。他们驰骋于大自然为他们铺就在马蹄下的广漠无边的草原上，无论在身体结构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完全适应了这种不断迁徙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便形成了草原内部的历史。关于这些人在黄河与布达佩斯之间的不停驰骋，定居民族的史册中只记载了很少的一点与之有关的事情。他们只记载了在他们的万里长城下，或在他们的多瑙河畔的堡垒下，在大同城前，或在锡里斯特拉城前，有过不同的侵略者拥入。然而，关于突厥-蒙古民族内部的一些活动，他们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蒙古高原的鄂尔浑河发源处的帝王都邑，喀喇巴尔噶逊与和林先后被一些有统治欲望的人占领，包括公元前的匈奴人、3世纪的鲜卑人、5世纪的阿瓦尔人、6世纪的突厥人、8世纪的回纥人、9世纪的黠戛斯人、10世纪的契丹人、12世纪的克烈部或乃蛮部，以及13世纪的成吉思汗蒙古人。即使我们能够一个一个地识别出曾经统治过其他民族的突厥或蒙古族部落，我们也并不知道突厥、蒙古和通古斯等这些有血缘关系的大民族最早的分布情况。现如今，通古斯人一定是居住在北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伯利亚中部叶尼塞河中游的通古斯卡河流域；蒙古人则聚居在历史上的蒙古本土；突厥人占据西伯利亚西部，及两个突厥斯坦。因为突厥族是后迁入的，在阿尔泰区域的突厥化，只能追溯到公元1世纪，而喀什噶尔的突厥化则在9世纪，河中是在11世纪。在城市，撒马尔罕与喀什一样，仍然以突厥化了的伊朗人为主。根据历史记载，成吉思汗曾经在蒙古本土上蒙古化

了许多原来很可能是突厥人的部落，如阿尔泰的乃蛮部、戈壁的克烈部、察哈尔的汪古部。在成吉思汗将所有部落统一于“青蒙古人”的旗下之前，蒙古本土的一部分仍属于突厥人，而且直到现在还有一个属于突厥民族的雅库特人仍然居住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勒拿河、英的格加河及科累马河的盆地上。这部分突厥人居住在北冰洋沿岸附近，在蒙古和通古斯以北的通往白令海峡的方向。因此，我们应该谨慎考虑“最初的”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上古时代，这些突厥-蒙古和通古斯人实际上居住在更远的东北，因为那时不仅在喀什噶尔，就连萨颜岭和大阿尔泰的北麓都被来自“印欧人共同的故乡”——俄罗斯南部的印欧人所占据。这种推测和语言学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伯希和与吉岳木·德·海维西就有充分的理由来否定阿尔泰语系与以乌拉尔为轴心的匈芬语系之间存在一种原始联系。然而，即使它们之间有原始的联系，今天的突厥语、蒙古语及通古斯语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这使我们想到在那个历史时代共同生存在亚洲东北部的三个不同人种曾经相距甚远。

如果突厥-蒙古游牧部落的历史只限于他们的驰骋和随意迁徙时的明争暗斗，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可以知道的东西就太少了。人类历史主要记载了这些游牧民族对南方文明帝国的多次进犯乃至征服。游牧民族的南下简直可以说是草原居住条件支配下的一种自然法则。毋庸置疑，就像12世纪的女真人之前的“蒙古人”一样，突厥-蒙古人部落仍然是定居在贝加尔湖森林地区与黑龙江流域，以渔猎为生的野人，他们过于闭塞地在僻静森林的屏风后面生活，所以对其他的土地丝毫没有渴求。而草原上的突厥-蒙古人则不同，他们以饲养牲畜为生，所以是理所当然的游牧者，畜群寻找牧草，人则跟随畜群。此外，草原还是马的故乡，草原上的人是天生的骑士。正是他们这些西方的伊朗人或东方的突厥-蒙古人发明了马的装备，就像在息姆米里人时代波斯佛尔的希腊式瓮上所描绘的斯基泰人那样。或者像我们从中国人那里看到的那样，公元前3世纪时，他们为了用骑兵抵御骑兵，模仿匈奴人用裤子代替了长袍。身手矫健的骑士是马上射箭的好手，他在逃跑的一瞬间从远处把箭射出来袭击敌人（帕提亚之箭，实际上是指斯基泰和匈奴人之箭）。他们作战时用的箭和套绳与追捕野兽时所用的工具没什么两样。

不过，在奔狂的途中他们偶尔会在草原的尽头看到农田的边缘，他们不可能不被那种完全不同的环境所吸引。在冰天雪地的严冬，草原会变成西伯利亚森林的附属物；在炎热的夏季，草原又会变成戈壁的延伸，这时游牧者为了给畜群找到草料，开始向兴安岭、阿尔泰或塔尔巴哈台的山麓转移。只有春天，草原上的草才会变得茂密，鲜花也在这个时候盛开，才可以称得上是家畜和牧人狂欢的季节。而在其他时节，特别是冬天，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眺望那南方温暖的土地、伊塞克湖和东南部黄河流域肥沃的黄土地带。实际上他们对于耕地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于是在占据了农田之后，他们出于本性立即把耕地还原为生长着羊、马吃的牧草的天然草原。就像13世纪的成吉思汗那样，征服了北京之后，便毫不客气地想把河北肥沃的平原上的黍田改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牧场。北方人是不懂农业的，直到14世纪还是纯粹的游牧者，愚蠢地抢劫自己的城市。如果乡下人在缴纳赋税时进行抵抗，他们便破坏水渠，淹没田地。但他们都很重视城市的文明产物，他们掠夺的目标尽是一些工艺品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他们喜欢相对温和的气候，但北京的酷热对成吉思汗来讲则太过“温和”了，于是在每次战役之后，他都要回贝加尔湖附近去度过夏天。同样，在他战胜了扎阑丁之后，故意放弃唾手可得的印度，只因为印度的气候对阿尔泰人来说简直是地狱中的热锅。不过，他对文明生活的便利怀有戒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玄孙们在定居于北京或大不里士的宫殿中后，便在这些地方堕落了。然而，只要游牧人还保持着游牧的心态，就会把定居的人们看做自己的雇农，把城市和耕田看做自己的农庄，并且进行压迫。他们骑马到定居民族居住的古老帝国去巡视，检查当地人顺从而定期缴纳的贡赋，如果当地人进行反抗而不愿纳贡，他们就会对毫无防备的城市进行抢劫。他们就像古代突厥人的图腾——狼一样，徘徊于鹿群的附近，趁机逐个咬死或者拖走落在后面的和负了伤的鹿。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掠夺与中国皇帝以恩赐的名义而付给的定期贡赋交替存在。总之，这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17世纪间突厥—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一贯做法。

不过，有时在游牧人中间也会出现少数熟知定居民族国家的弱点和内幕的人，他们对中国朝廷内拜占廷式的阴谋非常熟悉。他们会联合中国内部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联合中国的一个受排挤的觊觎王位者或一个割据的王国反对邻近

王国。然后他们的部落会宣布与帝国联盟，并打着捍卫帝国的旗号，在边疆建立政权。他们的子孙经过一世二世，对中国文化已相当熟悉，于是便会更进一步毫不愧疚地坐到中国皇帝的宝座上。而13世纪忽必烈的鸿图大志与4世纪时刘聪和5世纪时拓跋氏的想法没有什么两样。再经过二世或三世，这些汉化了的人就从文明中学会了懦弱和放荡的习性，却丧失了野蛮和粗暴。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蔑视，并且他们的土地也成为那些还在游牧生活中忍受着饥饿的胡人们垂涎的目标。于是，侵略行为又重新开始了。5世纪出现的拓跋突厥人毁灭并取代了富有的匈奴人与鲜卑人。而在北京，汉化了的契丹蒙古族人从10世纪起便成了爱好和平的主人。12世纪出现的女真人，最初几乎是野人般的通古斯族，几个月之内便从契丹人手中夺取了他们的大城市。然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汉化和过上和平的日子，便又被成吉思汗依照历史的惯例于一百年之后摧毁了。

凡是在东方存在的，在西方也同样存在。在欧洲，作为亚洲草原延伸的俄罗斯草原上，阿提拉匈奴人、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可萨人、佩彻涅格人、库蛮人、成吉思汗族人，交替出现。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伊朗和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征服者之间存在着伊斯兰教化与伊朗化的问题，这简直与中国出现的突厥、蒙古或通古斯征服者们的大规模汉化毫无二致。在这里，汗王变成了一个苏丹或一个国王，就像在其他地方变成一个天子那样容易，但很快就会让位于来自草原的更粗野的汗王。因此，我们在伊朗看到了他们互相消灭，互相继承，其中包括哥疾宁王朝突厥人、塞尔柱王朝突厥人、花剌子模王朝突厥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突厥人、昔班王朝蒙古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穆斯林大陆的最远端，在小亚细亚征服了濒死的塞尔柱人，再从那里直趋拜占廷，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蓝图。比约南德斯笔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加辉煌，亚洲大陆被看做是各民族的发源地和亚洲日耳曼尼亚，在民族大迁徙中，注定要为古老的文明帝国孕育苏丹和天子。草原上游牧部落曾经定期地把它们的汗王安置于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科尼亚、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上，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法则。不过还有一种相反的法则，即游牧侵略者慢慢被古老的文明国家同化的法则。这种现象包含着双重因素，首先是人口

学因素，那些野蛮的骑士们组成了分散的贵族阶级，并且淹没于这种古老得无从考证的人群中；其次是文化因素，被击败了汉族或波斯人的文明把粗暴的战胜者征服、陶醉甚至灭绝。在征服了50年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往往是那些被汉化或波斯化了的野蛮人首先为捍卫文明而抗御其他野蛮民族的侵略。因此在5世纪时，洛阳的君主拓跋突厥人自称是中国文化和疆土的保护者，他们坚决抵制蒙古、鲜卑或柔然人新的进犯和称霸。12世纪时，桑扎尔-塞尔柱在阿姆河上建立了自己的“莱茵河防线”以抵御从咸海或伊犁来的所有乌古思人或哈喇契丹人。克洛维与查理曼大帝的历史在亚洲全部重演了，就像与撒克逊和诺曼底日耳曼主义格格不入的罗马文明在被它同化了的法兰克人中寻找自己的根源一样，中国的文化也只能在5世纪的那些拓跋族人那里找到痕迹，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教除了上文里提到的英雄桑扎尔之外，便没有了更为忠实的捍卫者。更不可思议的是，古代的诸王或天子的功业是由汉化或伊朗化了的突厥-蒙古人来完成的。没有任何的科斯罗埃斯或哈里发能够登上圣-索菲教堂或罗马皇宫的宝座，而他们的那些不可预知的继承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竟然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这个梦想。同样，汉朝与唐朝统治全亚洲的幻梦是由13-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与铁木耳·完泽笃实现的，他们甚至将北京变成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亚细亚、高丽、印度支那的宗主国首都。因此，突厥-蒙古人虽然征服了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但最后还是相当于用武力为它服务而已。而事实上，就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皇帝那样，管理人民、统治古老的文明民族是一件十分符合他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和愿望的事。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都是为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而管理中国的；波斯则是为了完成萨珊与阿拔思王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圆顶宫殿的推进而管理伊朗的。

能够实行统治并建立帝国的民族为数不多，能和罗马人一比高低的也只有突厥-蒙古人了。

